



鲁迅

鲁迅与出版界

吴中杰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鲁迅与出版界

吴中杰 著

鲁迅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与出版界 / 吴中杰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ISBN 978-7-100-17336-0

I. ①鲁… II. ①吴… III. ①鲁迅研究 ②出版工作—
研究—中国—民国 IV. ①I210 ②G239.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70425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鲁迅与出版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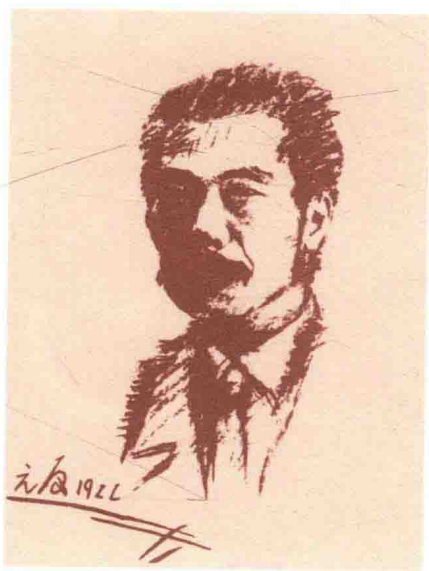
吴中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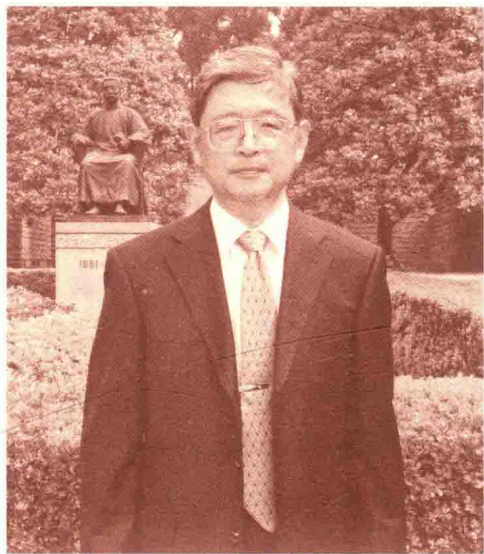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
集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17336 - 0

2019年6月第1版 开本 889×1194 1/32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张 7 1/4

定价: 48.00 元





吴中杰

1936年生，浙江临海人。195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留校执教。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和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同时兼写杂文随笔和纪实文学。著有《文艺学导论》《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吴中杰评点鲁迅作品系列》《鲁迅的艺术世界》《鲁迅传》《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等；主编有《1900—1949：中国现代主义寻踪》（合作）、《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论》等；散文集有《人生大戏场》《旧途新旅》《海上学人》《复旦往事》《曦园语丝》等。

前言

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出版社，是制造书籍的运作机构。文化人要著书立说、创作翻译，就不能不与出版社打交道。而书籍的出版，又受政治气候、时代思潮与市场因素的影响，且牵涉一些社会关系，于是就演绎出许多悲喜故事。

鲁迅从小喜欢读书，并学习对课作文，青年求学时代就开始译作出书，曾经有过顺利的开端，但当他在译作上自有主张之后，接着便到处碰壁，发表的文章没有呼应，出版的书籍行销不动。这种艰难寂寞的处境，不仅有资历和人事上的关系，更因为他的思想过于超前，得不到读者的理解，使他有置身于荒原的感觉。直到新文化运动兴起，他才从寂寞中走出。由于时代思潮的变化，超前思想已成为时尚潮流，他的著作也大受读者欢迎。于是，鲁迅的写作和出版就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但这时，鲁迅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多发文章、多出书，而是如何培养和带动青年作家来推进新文学事业的发展。于是，他积极组织、参与青年文学社团，帮助青年人发表和出版作品。鲁迅曾支持

新潮社，把自己的著作交给他们出版，后来又相继组织莽原社、未名社、朝花社和奴隶社，还参加左翼作家联盟，虽然或受欺，或受攻击，但希望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不死。

鲁迅与出版界接触得久了，深知适应文化市场的需求对于出版业的重要性。但是，他不愿迁就市场去制造畅销书，而是从文化发展的需要出发，来推动书籍市场的发展。青年作家的出道之作和翻译文学，都是难以销行的作品，但他认定它们对文学发展有利，就勉力从事，为北新书局主编两种丛书：《乌合丛书》与《未名丛刊》。前者多出青年作家的创作，后者则专出翻译文学。接着他又将《未名丛刊》移交未名社，推广翻译文学事业。后来，他翻译革命文学理论作品，出版俄苏文学丛书，也沿着这条路子走下来，对读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书籍市场也起了推动作用。所以，作家和出版家对于文化市场，不但有个适应的问题，而且还有提高的需要。鲁迅正是在适应和提高的辩证关系中从事出版事业。

鲁迅是一个启蒙主义者，他写作、出书的目的是为了启发群众的觉悟，写真实是他的创作守则。他对青年作家说过：“写出实情，即于中国有益。”但蒙昧主义者却最怕揭出实情，封锁、查禁之事常有。到国民党统治时期，还公然公布了书报检查条例。于是，与书报检查制的斗争，就成为鲁迅写作和出版生涯的一个重要内容。他的笔名之多，笔调之曲折，就由此而来；而自营出版社，也是为了出版不能公

开发行的作品，后来也用来出版不能盈利的画册。

鲁迅不但是文学家，而且是一个审美教育家。他前期在教育部工作时，就从事审美教育，后期在上海做了自由撰稿人，又自费出版了很多美术书籍。这不是为了案头清玩，也不是为了市场盈利，而是为了将外国刚健的艺术介绍进来，并将古代清新的艺术翻印出来，一方面给人以美的欣赏，同时又想培养出新的艺术人才。

鲁迅晚年以写作为职业，书籍愈出愈多，可以说与出版社打了一辈子的交道，为中国的出版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他与出版界的关系，并不因逝世而终结，其死后还陆续有遗著出版，他的出版理念也自有继承者。

鲁迅有些书，生前来不及出版，直到死后才作为遗著印出。如《且介亭杂文》和《且介亭杂文二集》，是鲁迅自己编好未及出版的，《且介亭杂文末编》则还来不及编集，后由许广平补编，都在鲁迅死后才出版。还有，鲁迅晚年想汇集自己从1907年从事文艺运动以来至1936年的作品，出一套《鲁迅三十年集》，以资纪念，书目都已编定，但未及出版却突然逝世。鲁迅死后，此书也多经周折，直至1941年10月，才由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

鲁迅曲折和复杂的出版经历，不仅是个人的出版史，而且与时代的文化史、政治史和社会史相关，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目 录

- 1 / 前言

- 1 / 一 鲁迅早年的出版遭遇
- 27 / 二 鲁迅与文学社团的出版工作（北京时期）
- 59 / 三 鲁迅与文学社团的出版工作（上海时期）
- 83 / 四 鲁迅与北新书局
- 103 / 五 鲁迅与革命文学理论的翻译和出版
- 125 / 六 鲁迅与俄苏及东北欧文学的翻译和出版
- 147 / 七 鲁迅与书报检查制的斗争
- 173 / 八 鲁迅印画与审美教育
- 205 / 九 鲁迅书籍的装帧艺术
- 223 / 十 鲁迅的广告学

- 233 / 后记

鲁迅早年的出版遭遇

鲁迅早年的写作、出版活动，从1903年开始，到1917年结束。这段时期，他有着青春焕发的热情，有着顺利的写作开端，但接着便屡屡碰壁，陷入苦闷失望的情绪。这种焕发和失望，都与时代相关。

正是“风雨如磐暗故园”的现实，激起鲁迅启蒙主义的写作热情；却是“寄意寒星荃不察”的冷遇，使得他陷于绝望的境地。

鲁迅的苦闷，是一个先行者的苦闷；他的失败，是一个不被理解者的失败。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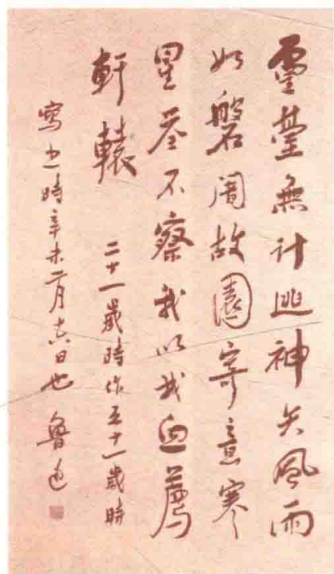
鲁迅于1902年三月，以官费生资格东渡日本，四月，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开始学习日文；次年——1903年即开始翻译作品，并据外文资料写稿，时年二十二岁。那时，他意气风发，热情高涨，文章写得激昂慷慨，顿挫抑扬，适应了当时的风气，因而接连得以发表。



1903年的鲁迅，摄于日本留学时剪辫后

但是，出版书籍就不那么容易了。

他的文章得以顺利发表，除了文风适应时尚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编辑部有朋友。当时留日学生常常按省份出版自己的刊物，比如浙江省留学生出了《浙江潮》杂志、河南省留学生出了《河南》杂志。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在《浙江潮》做编辑，所以鲁迅那时写的文章都发表在《浙江潮》上。计有小说《斯巴达之魂》，论文《说钼》《中国地质略论》，译文《哀尘》，署笔名“自树”“索子”或“庚



鲁迅《自题小像》，1903年作于东京

辰”。但在出版社没有相识者，出书就多所波折，稿件或收或不收，收了之后，或以译者自己的笔名出版，或者变成他人的译作，难以言说。

鲁迅早年学习科学，重视科学思想的宣传，上面所说《说钼》一文，就是最早向国人介绍“镭锭”之文章，很有历史意义；《中国地质略论》，则介绍中国地质情况及矿藏分布，并且发出爱国的呼声：“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捡；可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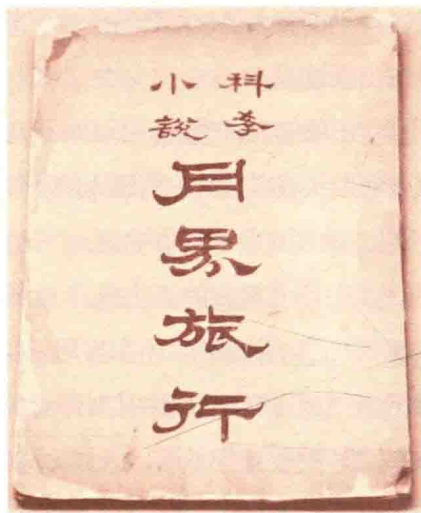


《浙江潮》，浙江籍留日学生
1903年在日本东京创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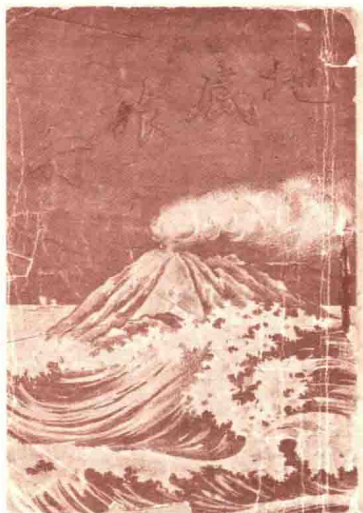
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覬覦者也。”他同时又喜欢文艺，认为科学小说是借文艺的力量来宣传科学思想的好方法，所以就翻译了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两本科学小说《月界旅行》（当时误为美国“查理士·培伦”作）和《地底旅行》（当时误为英国“威男”作）。前者于1903年十月由东京进化社出版，后者于同年十二月由南京启新书局出版。关于这两本书及早期其他作品的发表和出版情况，鲁迅在1934年

给杨霁云的几封信中有所忆及。那时，杨霁云想将鲁迅集外散佚文章编辑印行，写信向鲁迅征求意见，并请教其早年文章之去向及其他未结集文稿的情况，故鲁迅于复信中多有追忆。在鲁迅的积极配合下，杨霁云编辑的鲁迅著作《集外集》，得以在次年出版。

鲁迅在1934年5月6日给杨霁云回信中说：“那时还有一本《月界旅行》，也是我所编译，以三十元出售，改了别人的名字了。”这就是说，出版社付了稿费，买下稿子，却署上别的名出版。“还有《地



《月界旅行》



《地底旅行》

底旅行》，也为我所译，虽说译，其实乃是改作，笔名是‘索子’，或‘索士’，但也许没有完。”《地底旅行》署“之江索士译演”——译演者，指在翻译时有所演义，并不忠实于原著，这就是鲁迅自己所说的“改作”。

此外，还有一些译作，则下落不明。如上信还说道：“又曾译过世界史，每千字五角，至今不知道曾否出版。”接着，5月15日信中又说：“那时又译过一部《北极探险记》，叙事用文言，对话用白话，托蒋观云先生介绍于商务印书馆，不料不但不收，编辑者还将我大骂

一通，说译法荒谬。后来寄来寄去，终于没有人要，而且稿子也不见了，这一部书，好像至今没有人检去出版过。”

从这些回忆中，可见鲁迅早期译作出版的曲折情况。不出版倒也罢了，他特别讨厌的是，有些人以金钱购买或以权势窃取别人的著作权占为己有的文贩或文霸行为。所以，他在5月6日信中说：“张资平式的文贩，其实是三十年前就有的，并不是现在的新花样。”大概杨霁云在回信中，将张资平式的文贩与战国时期秦相吕不韦雇用门客著《吕氏春秋》之事相提并论，鲁迅在5月15日回信中又对两者的差异做出区分：“张资平式和吕不韦式，我看有些不同，张只为利，吕却为名。名和利当然分不开，但吕氏是为名的成分多一点，近来如哈同之印《艺术丛编》和佛经，刘翰怡之刻古书，养遗老，是近于吕不韦式的。而张式气味，却还要恶劣。”

鲁迅对于出版界的卑劣情况，是深恶痛绝的，他晚年在杂文中还不断地加以揭露，如《序的解放》《各种捐班》《“商定”文豪》《大小编》《化名新法》《书的还魂和赶造》等。可惜多年以来，这种风气不但没有克服，反而恶性地发展，愈演愈烈。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这段时期，鲁迅还与当年的矿务铁路学堂的同学顾琅合编了一本《中国矿产志》，于1906年七月由上海普及书店出版。但他在给杨霁云的信中并未提及，可能因为这不是文学作品，而且又是与别人合著之故。1938年版《鲁迅全集》也未收此书，后被发现，收入《鲁

迅全集补遗续编》。这本介绍中国地质构造和矿产分布概况的书，不仅是一本地质学矿产学著作，实则与反对外国人掠夺中国矿产，维护国家矿权的现实斗争有关，所以在当时很引起国人的重视，爱国教育家马良（相伯）还为之作序，到次年二月，本书就出了第三版。在第三版封底上，刊出了鲁迅所撰的《中国矿产志》“征求资料广告”，内云：



《中国矿产志》

“惟望披阅是书者，念吾国宝藏之将亡，怜仆等才力之不逮，一为援手而俛助焉。凡有知某省某地之矿产所在者，或以报告，或以函牒，惠示仆等，赞成斯举，则不第仆等之私幸，亦吾国之大幸也。”可见，他当时还准备对之再加修订、增补，继续出版。

（二）

弘文学院，是中国留学生初到日本时就读的预备学校。在那里，留日中国学生除学习日文之外，还要补习基本的科学知识，因为中国科举制度下的士子们，是只读子曰诗云，作八股文，而不学理化生物

等科目的，所以这一切要从头补起。这就是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所回忆的：“在这里，三泽力太郎先生教我水是养气和轻气所合成，山内繁雄先生教我贝壳里的什么地方其名为‘外套’。”

但鲁迅的经历与一般留学生略有不同。他毕业于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在那里已学习过格致、地学、金石学等科目，有了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所以在弘文学院的学习相对比较轻松，还有时间可以译作。1904年四月，鲁迅在弘文学院结业，九月，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他想用医学来推动国人的维新，并救治像他父亲那样的病人。这里的课程是全新的，学习相当紧张。入学不久，他在十月八日致蒋抑卮信中说：“校中功课太忙，日不得息。以七时始，午后二时始竣。树人晏起，正与为雠。所授有物理，化学，解剖，组织，独乙种种学，皆奔逸至迅，莫暇应接。组织，解剖二科，名词皆兼用腊丁，独乙，日必暗记，脑力顿疲。”这样，他就没有时间再来大量译作了，只在1905年春间，译了一篇美国路易斯·托伦的科幻小说《造人术》，发表在上海《女子世界》上。

但不久，他受了日俄战争宣传片的刺激，思想有所变化。

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